

一位书生,一生风雨兼程,奔波劳碌,他最重要的抚慰之地,应该是在哪里呢?在我的观念中,那一定是书房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与书房类同的场所很多:教室、书店、研究室、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它们的相同之处,都具有阅读的功能;不同之处,书房还是一个休憩的场所,或曰心灵与生命的慰藉之地。

书房的慰藉

俞晓群



学生时代,书房尚在初期或象征的状态,它可能只是家中的一个小书架,一张小书桌,床头柜上的一个小书立,甚至只是少年书生四处求学时,背在肩上的一个大书包,或者只是堆放在枕边的一堆学习资料。即便如此,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而言,书房的雏形已经显露出来,他需要在那里完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梳理纷乱的思绪,消化每天获得的所见所闻,学会独立思考。这样的书房或曰准书房,是他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地方。

成年之后,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为了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都需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书房几乎成了当代文化人的标配。稍作回想,许多工作一天之后,一定有过那样的经历:疲惫地回到家中,安顿完生活中的琐事,缓步来到书房,选一个舒服的姿势落座,沏一杯清茶,舒一口气,让自己静下来,慢下来,或闭目养神,或翻开书本,或打开电脑,或摆上笔砚。生活频道的调换,不但可以得到一时的清心自在,还可以帮助你整理思绪,知识充电,预备功课,修复创伤,增强自信,以便走出书房时,能够神清气爽,焕然一新。对书生而言,书房的调节功能,一定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进入老年,书生开始逐渐远离主流社会的舞台。此时的老人,需要面临三退:工作岗位要退休,社会活动要退出,家庭地位要退让。那么退到哪里才是最佳选择呢?其实一个人的老年生活,各有所好,各有追求与无奈。我觉得最好的归宿,当然是遁入书房了。但实现这一步并不容易,从年轻时开始,就需要有所准备:一是尽早养成阅读的习惯,不断积累自己的知识,这样进入书房,才知道在那里做什么。二是尽早养成藏书的习惯,积年累月,有计划地保存不同时期的图书

与资料。如此构成的书房,才名副其实。三是书房的功能不仅在收藏有价值的书,更重要的是收藏与你相关的书,记录你与那些书的故事,这样的书房,才会有浓浓的暖意。四是书房的藏品不单是图书,还有几十年留存存物品:每一本笔记,每一件杂物,每一张照片,每一段留言,每一个纪念品,甚至一张纸条、一枚印章、一行签字,都是一个人生活的印记,有了它们的存在,书房才有了个性的意义。

一个人的老年生活,各有所好,各有追求与无奈。我觉得最好的归宿,当然是遁入书房了。

书房建设,有了环境的准备还不够,还需要有心境的承接。常言“让我们诗意地栖居!”诗意的基础,需要心态的平和,需要心灵的净化,需要消解各种变化带来的焦虑,需要使自己的精神状态,得到良性的调整、重塑与完善。不过真正做到“诗意地栖居”谈何容易,经过漫长的人生旅程,我们是否依然保持着应有的书生本色?往日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我们是否还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滚滚红尘中,经常会听到一些人的口头禅:“工作太忙了,将来要如何如何。”现在,你孤独地坐在书房中,旧日的种种计划与思考,往往会化成支离破碎的断想,纷纷涌现,不可抑制。弄不好,还会搞得抑郁顿生,寝食不安。如此下去,该做不了的事情,还是做不了;该坐不住的椅子,还是坐不住;该做不出的文章,还是做不出。总之,如果不能使自己安静下来,进入心灵的避风港,我们的书房建设还有什么意义呢?那还真不如起身走出去,找点别的事情来做。

此时,我想到沈昌文先生的老年生活。他在任职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退休后的生活

依然丰富多彩,还做了许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被誉为当代“新老年”的代表。关于他的书房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沈先生退休时有两处住房,它们分处京城朝阳门南小街的两侧,一套位于街东的赵堂子胡同,另一套位于街西的西总布胡同,两者之间,大约有几百米的路程。房屋的格局陈旧,使用面积都只有几十平方米。沈先生开玩笑称它们为一房、二房,街东的一房用于居住,街西的二房用作书房。二房里摆满了不同规格的书架、书柜、书箱,彼此的间距很窄,走过时几乎要侧身。室内的家具很少,主要有一个书桌、一把椅子、一张弹簧床,还有电话、电脑、传真机、复印机。沈先生说,他退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养成作息习惯: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天还没亮,他就会从一房中走出来,穿过南小街,来到二房,开始忙活起来:煮咖啡,整理书架,上网,写作,下载资料,收发邮件、传真,打印重要文章。到了七八点钟,他出去吃早点后回到二房,躺在那张弹簧床上小睡一下,再接着工作,抑或去大块文化、三联书店、海豚出版社办事。中午他在街巷中找一处洁净的小馆,点一杯啤酒、一碗羊杂碎之类的东西,独自享用,然后回到一房休息。下午继续去二房工作,或者去书店看书、买书,参加各类读书活动。晚上除了约见客人,一般要在九点钟以前安睡。

按照这样的作息习惯,沈先生从65岁退休开始,一直持续到90岁离开这个世界,大约度过了25年的美好时光。总结一生的经历,官方称他二十几岁进京,从事出版工作六十年,成为一位优秀的出版家。这里的“六十年”,自然包括沈先生退休后,在二房里工作的二十多年了。在那里,沈先生边养老边做事,完成的业绩,丝毫不逊色于退休之前的成就,成功地延续了一位出版家的职业本色。比如,他由《读书》杂志主编退下来,成功地策划了《万象》杂志的出版;还组织策划了《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许多好书。沈先生曾经对我说:“我乐于扶持晚辈的工

作,但不要把我当成领导,我只是一个助理编辑。”实际上在与我的合作中,他充任了一位总编辑的角色,从确定出版方向、选择书稿、组织作者,到终审书稿、设计版式、确定装帧等诸多案头工作,甚至到图书馆中查阅资料,从国外带回好的版本。他真正实现了退休前后,出版职业的无缝衔接,同时也做到了从办公室到书房的完美过渡。

人总是要老的,总结沈先生的二房生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65岁到75岁,沈先生经常说:“我还有力气,可以帮你们多做一些事情。”那时他书房的布局,完全是在任职时总经理办公室的延续:一叠叠文件夹摆放在那里,其中有重要资料、信件,还有书房藏品的目录;书房中的书柜、书架上,都标注着收藏的内容,其中除了图书之外,还有许多稿件、审读意见、专题研究。有些书柜是锁着的,里面存放着一些“内部资料”。二是75岁到85岁,沈先生开始说:“我老了,精力不济,更多的时候,只能给你们拍拍手,站脚助威。”十年之中,他开始有计划地为自己的书房做减法:先是清理出许多书的复本,不断送人;接着他按照藏书的分类,比如许多工作用书,他也开始成批送给需要的人,我就收到他100多箱此类杂书。对于他的许多信件、原稿、审稿意见等资料,他十分珍视,处理起来也很慎重,几次说要全部交给我,但迟迟没有拿出来,只是在编他的著作时,他说:“编好书后,原件就存在你那里吧。”但后来他清理书房时,还是流出一些文字材料,市场上可以见到。三是85岁到90岁,沈先生的身体日渐衰弱,二房中的故事越来越少,最终他连跨过那条南小街的力气也没有了。

退休后的25年间,沈先生在二房中完成著作:《阁楼人语》《知道》《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师承集》《师承集续编》《八八沈公》。当老人家89岁时,我想再编一本书,为他90祝寿。沈先生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那几箱资料你们都拿走吧,整理好再给我看。”

匠人技艺和精神不会消亡

郭平



纸箱中整齐摆放着几本塑封得严严实实的新书,出现了片刻的选择困难,于是一本本拈起来,隔着塑料薄膜细细打量。轮到《瓦猫》时,手上顿感一轻,心头微微动,不禁再次打量着这本“有关手艺人”的书。举重若轻,何尝不是一种对于读者独具匠心的关怀?于是欣欣然拆封。

由偶遇到探寻的故事

正如作者葛亮所言“访匠人……他们多半朴讷,不善言辞”,那么作者文学博士的学历背景,如果遇到“只有谈及自己的手艺,他们会焕发光彩,因为来自热爱”的匠人们,该如何进行沟通,并被接纳,最终将所闻所见呈现出来?合上书本,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因为阅读的轻松,也因为作者表现方式的流畅,事件场景刻画的细致体贴。

《瓦猫》实际上分为三部分,讲述了三种匠人的故事。

《江南篇 书匠》写的古籍修复师,从毛教授为了修复祖父受潮发霉的书稿,引领读者在香港穿街过巷,并伴随着少年时的回忆,拜访了两个代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脉络的修复师,层层展开的情节,让人逐渐走进他们“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执著与坚守的内心世界。

《岭南篇 飞发》则从研习古文字的博士改行开理发店这个令人读后良久仍感震惊和苦涩的“小事件”入手,引领读者随同毛教授探访师兄翟健然请教甲骨文字,从而结识了两位经历了香港经济起飞时代的理发师,篇中大约为了体现地方特点,使用了较多的用生僻字表现出来的岭南方言。相较于古籍修复师较为厚重的探究色彩,作者更多地着笔墨于两位理发师的跌宕。

《西南篇 瓦猫》是本书的破题之

“任何一种手艺,长期地打磨,都将指向微观。因此,他们多是囿于言词的,因为向内心的遵守,使得他们的交际能力在退化之中……但是,一旦谈及了技艺,他们立刻恢复了活力,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不是在作品中,而是在《瓦猫》的附录中,作家葛亮道出了在完成这部“有关手艺人”的过程中,深入观察和了解手艺人生活后发现的矛盾现象,折射出的却是匠人在现代社会当中随时面临的孤寂。

作,毛教授在香格里拉旅行中偶遇仁钦奶奶,由送达一封信件开启了对瓦猫制作陶艺师的探访之旅。一口气读下来,没想到这一次探访居然一下子回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代。陶艺师的回忆中,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城郊生活的场景一一闪现,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冯亚兰夫人这些熟悉而令后世仰慕的身形生动再现,甚至有点让人对一直守望在那里的瓦猫生出嫉妒之情。

“匠”关乎传承抑或坚守

相比于《瓦猫》中的丰富人物感情和故事,更为打动人的是作者对于手艺人关注,毕竟如果脱离开这个人群,仅以情节论,在这个穿越系文学作品风行的时代,多少离奇的故事都可以在作者选定的人物身上铺陈开来。

葛亮在《自序》中写道:“匠”字的根本,多半关乎传承抑或坚守。那么能不能守住手艺人这个基本形象,就格外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人生体验。

古籍修复师老董的学徒经历:吃过晚饭,给我两升绿豆,到门廊外头,就着月光,用筷子一粒一粒地拣出来一个窄口葫芦。第二天天亮,师父倒出来……就



这么整整半年。我看针鼻大的眼儿,也像个巴掌。

理发师翟康然学徒经历:这一天收工前,庄锦明点起一炷香,要求扎马步,然后用手摇晃一支筷子……但不久之后,他感到腿开始沉重,手腕也因无依恃发起了酸。

对于制作瓦猫的陶艺师,葛亮大约觉得对方是女孩子,则在笔墨上更为关切些:荣瑞红坐在黑暗里头,手在娴熟地动。作坊里有蜡,她不动。一团泥,像是长在在了手上。手指的动作,跟着心走。心想到哪里,手就跟到哪里。她想,原来眼睛是多余的。

卖油翁以一句“唯手熟耳”概括了技艺的精髓,但又怎么能像《瓦猫》这样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匠人技艺的养成?

现代问题与传统的方法

葛亮在附录中写道:我更感兴趣去写的,是民间那些以一己之力仍然野生的匠人。

确实,在现代社会中,机器制造能力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手工业者面临着物竟天择般的残酷淘汰,进而极易诱发壮士暮年的悲凉情绪。

其实在《瓦猫》中,这种担忧与惋惜情绪贯穿在三篇作品当中,古籍修复师简忽然中风,她的修复成果通过公益组织捐赠给了几家图书馆;奋斗了一辈子的理发师患上了绝症,在明里暗里竞争多年的老对头帮助下,理完最后一次发,阖上了双眼;陶艺师在城市拆迁改造的大背景下,仅在野外的一处仓库勉强栖身。

这样的情节安排反映出作者对匠人群体乃至匠人传统和精神能否传承的担忧。

文前特意关注了作者的学历背景,是因为反映匠人或者手艺人仅仅凭典籍和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自古以来工匠技能不仅仅是传承,更重要的着力点在于创造。传承是巩固已知,而创造则迈向人类的未知。

一位自幼见识了机修车间的油渍环境而立志当科学家的物理学博士,每天在置于液氮中只有500微米大小的芯片上,一纳米一纳米地寻找量子光源,使用的是曾经试图努力远离的各色扳手、螺丝刀,常常感叹:兜兜转转十多年,一夜又回到从前。

工匠技能如同锋刃一般,仍然装在高科技探索的前沿,发挥着拓荒的作用。

正如葛亮所说的“用传统的方法解决现代问题”,甚至不止于此,在人类面对未知世界的认知边缘,没有现成的机器可凭依,仍然需要血肉的双手来推进对未知的探求,换句话说,只要有未知未知的存在,人类社会所传承的匠人技艺和精神便不会消亡。

如此看来,尽管有一定局限性,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瓦猫》对于手艺人的关注,未尝不是于人类精神世界实现有关认知的一个突破。

书写即热情的挥洒

王铁军

《这方热土》

杨海蒂的《这方热土》是对海南岛热带雨林的勾勒,丰富宏大却不流于粗疏,壮阔豪迈又不失细致。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猕猴岭、七仙岭、鹦哥岭、五指山被她请入字里行间,耸立起独特的风貌。在这本书里,杨海蒂既是作者又是导游,她把热带雨林里的自然风光如数家珍地在字里行间娓娓道来。

当然,她与一般的导游不同。职业导游因一遍又一遍的讲解,常心生倦怠或无所用心,故而心不在焉是普遍现象。杨海蒂则不然,她全身心投入。她的书写她由于热爱,而不是出于职业所需的习惯性操作。

它不是千篇一律的旅游观光手册,而是兼具文化含量与历史重量的读本。文化含量在黎族人居住的由船型屋演变而来的金字屋里,还在黎母山上流传至今的种种神话传说里。而对革命英雄事迹的追忆,则显示了热带雨林里蕴藏的历史重量。海南岛是作者工作过、生活过、悲伤过、欢笑过的一方热土,是她的第二故乡。对她来讲,书写即还乡,是一趟独特的还乡之旅。

《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唱〉》

张光年的儿子张安戈撰写的《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唱〉》是一部传记,以张光年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从1913年出生于湖北光化县老河口口写起,以于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的1939年3月为止。不是长长一生的传记,而是截取从孩提时光到将近而立之年的短传,勾勒张光年从懵懂幼稚到成熟的这段人生履历。身为张光年的儿子,张安戈写父亲的传记之情感动力,在于接过父亲的爱国热忱。这一次创作是血脉相连,更是使命推动。

如果没有胸怀一颗赤子之心,怎么会有传唱不衰的《黄河大合唱》?他为祖国歌唱,为同胞歌唱,为革命歌唱,为抗战的终将胜利歌唱。如果说《黄河大合唱》的谱写是高潮的话,《赞美新中国》与《保卫大武汉》连同《五月的鲜花》在内的众多作品,都是高潮即将到来前的蓄能蓄势。它们没有《黄河大合唱》那样的传唱度与影响力,却与之同样不可缺少。

“热血青年们唱着这首歌,愤而参军,冲上前线!”张光年不仅是词作者,也是振臂一呼的歌手,他身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屈的信念,而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那个时代的青年人。

《你的苦痛,与我相关》

从小镇医生的女儿,到校医、烧伤科医生,再到去进修,后到成为一名社区医生,作者向读者展示了她作为医生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身心变化,以及面对不同患者的多元视角与反思;作者自身的职业路径也不断明朗,这与国内医学事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不论是作为颇具自传性质的医学生涯的阶段性总结,还是记录多年所经历的基层医疗事业的变迁,这部作品对于医学生、医生或是广大读者都是很有价值的。

“现在,我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一些故事,让亲爱的读者走近医生,以便在往后的岁月里,我们能够用更客观的眼光看待生死。生而为,迟早都会面对这些问题。”

由此可知,陈妙珍写作初衷不只是为了她自己,不只是代表她个人。而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代表医生群体的一种做法。这其中虽有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竭尽心力,还有主动敞开心扉、邀请读者进来的满腔热情。

书写即热情的挥洒,与那些从来不写甚至不习惯写的同行相比,这份热情多么难得。

